

社会行动与结构视角下体操运动员参与行为研究

陈丽妹

(福建医科大学 体育教研部, 福建 福州 350122)

摘要:基于社会行动理论对体操发展进行调查,发现不同年代体操运动员的参与行为不同。以社会结构转型为基础,比较分析不同年代体操运动员的参与行为,以社会行动与结构为研究视角能解释体操运动员参与行为的转变,基于此,提出相关体育职能部门应制定符合社会转型的对策,体操运动员应积极适应社会转型的建议。

关键词:社会结构;社会行动;举国体制;体操;参与行为

中图分类号:C03;F2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784(2021)04-0090-04

体操项目是中国优势竞技体育项目,这一项目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获得9枚金牌。但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体操仅获得2枚铜牌,中国体操队的成绩“滑铁卢”下降。体操发展面临困境,后备人才锐减,参赛人数减少,体操项目成材率低。因体操运动员的低龄化,所以运动员的退役、安置等都面临问题。社会对体操关注度减弱,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会媒体以关注“体操辉煌的运动成绩”为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竞技体育的关注也发生了转变,更加关注“运动员个体”发展。媒体把焦点放在“运动员个体”上,体现对运动员个人发展的重视。

社会行动与结构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研究竞技体育运动的新视角,该理论能解释竞技体育项目的社会现象^[1]。“举国体制”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制度保障。受社会转型的影响,竞技体育发展被重新审视^[2]、重新定义,社会转型对“举国体制”做了新调整,社会转型也是社会结构转型,竞技体育发展受社会结构转型的影响^[3]。体操项目的研究多集中于体操技术特点、艺术表现、难度发展和评分规则等,分析社会结构对体操运动员影响的研究较少。笔者通过研究不同年代体操运动员参与行为的差异,分析体操成绩骤降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法。2020年7月—9月,笔者在F省进行了为

期3个月的访谈与调查,访谈对象涉及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的体操运动员、运动员家长和教练员。

一、不同年代体操运动员参与行为差异的分析

体操运动员作为行动者,参与体操的出发点及行动特征受客观环境(如社会原因、家庭原因等)影响,在不同时期参与动机、参与目的不同。

(一)不同年代体操运动员参与行为的社会原因

人类的社会行为是社会属性行为,需服从一定的目的。马克思·韦伯将人类行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客体在环境中表现和他人表现的预期,行动者把这些预期用作“条件”或者“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标^[1];价值理性决定了对某种特定行为方式无条件的内在价值信仰,无论该价值是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只追求该行为本身,而不管其成败与否^[1]。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能解释人类的参与行为,体育活动参与行为是人类社会行为的一部分^[1]。因此,体操运动员作为行动者,参与动机受工具理性的影响,表现出为健康、工作和兴趣等参与目的^[4]。

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举国体制”,是以提高国家竞技水平为目标的体制。它以国家利益为最

收稿日期:2020-10-20

作者简介:陈丽妹,女,副教授,体育学硕士。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高目标,国家承担经费来配置软硬设施,集中选拔、培养和训练优秀的运动员来备战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以争取优异的竞技成绩为国争光^[5]。在“举国体制”下,体操运动员有培养、竞赛、就学和就业安置等保障。“举国体制”集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调动了运动员的积极性。参与体操训练的运动员最终都要面临退役、再就业和安置的情况。但随着社会的转型,“举国体制”的转型对体操运动员的退役安置的方式也不同。体操训练是一项身体、精神上的挑战,运动员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困难与矛盾,但追求优异竞技成绩的动力(如“奥运冠军”)是一致的。20世纪70年代竞技体育以“举国体制”为主。20世纪80年代之后,运动员参与训练的目的性增强,选择体操训练是为了退役后稳定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多样化的退役安置形式,运动员参与目的除了强身健体,也为了有更多更好的再就业机会。

竞技体操作为“举国体制”下的优势竞技项目,运动员各方面的发展也备受支持。通过访谈了解到,运动员参与体操项目多以退役后有保障的工作和较好的前途为出发点。所以,在“举国体制”背景下不同年代体操运动员参与体操项目的社会原因较为一致。

(二)不同年代体操运动员参与行为的家庭原因

因体操项目低龄化,参与竞技体操的运动员受家庭和教练的影响大。家长让其坚持的动力是追求荣誉、成绩和有保障的工作。教练也多宣传练习体操的好处,如退役后的就业安置、升学机会和稳定工作等。

访谈结果显示,家长让子女选择体操训练的原因包括,首先为健康,因体操选材低龄化,选材年龄一般在4~5岁,儿童在该阶段体质较弱,家长希望以此达到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目的。其次为工作,在“举国体制”的政策保障下,体操运动员退役后有安排就业的机会,如在业余体校担任教练或在事业单位工作,获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就业机会好,运动员退役后可能有一些伤病,但可以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运动员能坚持训练直至退役,会获得稳定的工作安排,这对当时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是极好的事。再次为就学,20世纪90年代之后,“举国体制”对运动员以“退役金”的形式安置,运动员领到退役金后可选择再就业、从事体操教练或其

他职业,退役后的机会更广。

(三)不同年代体操运动员文化学习的差异

“举国体制”是奥运夺金的有力保障,这一体制下重技术、轻文化的情况已凸显弊端,所以社会转型也进行了改革。不同年代对体操运动员文化学习的时间安排大多相似,仅仅在制度层面上对文化学习的重视和要求不同。文化学习一直伴着运动员的成长,不同年代体操运动员对文化学习的态度不同。

关于文化学习,调查显示,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市级运动员参加体操项目集训期间,文化课安排仅半天。省级运动员以全天训练为主,仅在晚上安排文化课程。运动员参加越高级别的专业化训练,文化学习的时间就越少。退役运动员因坚持文化学习有机会参加高考,进入高校学习的运动员毕业后多从事高校教师工作。访谈结果显示,在高校就业的教师也庆幸当时对文化学习的坚持。而没有机会参加高考、直接退役的体操运动员大多进入业余体校从事教练工作或其他较为稳定的事业单位工作。所以,这个阶段的体操运动员倘若重视文化学习,一般能获得较好的工作机会。

20世纪90年代的运动员对文化学习的态度是“力不从心、无可奈何”,面对训练充满激情,面对文化学习则是无奈,面对考试更是束手无策。他们的思想挣扎因社会转型而加大,随着“举国体制”的改革,重技能的同时重运动员文化学习。近年来,国家体育总局对运动员的参赛资格进行了明确规定,参赛运动员必须通过文化考试并达到相应要求方可获得参赛资格。

调查显示,尽管体操运动员参赛增加了文化考试的要求,但实际执行效果并不佳,运动员主动进行文化学习的动力不足。因运动员自身认识不足、教练员的竞技成绩压力以及家长们思想认识的偏差,运动员文化学习处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矛盾局面。20世纪90年代,运动员在役期间对学习文化的认识不足,大多数运动员认为好的体育竞技成绩重于一切。已获得优异成绩的奥运冠军多成为广告代言人或进入娱乐圈,大多数运动员在成名后的商业前景较好,现役运动员潜移默化中变得只重视训练而轻文化学习。

二、不同年代体操运动员参与行为转变的理论解释

(一)“社会结构”转型导致“举国体制”转型

优势竞技项目成绩下降,后备人才锐减,这些问题值得探讨^[6]。分析发现体操的发展受社会结构转型影响巨大。体操运动员的参与行为以“社会结构转型”为基础,通过分析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进行解答。尽管体育职能部门对体操项目的发展持重视态度,但多方重视也无法改变体操受社会关注程度下降的结果。宏观上看,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转变相对应,有必要对体操的历史发展轨迹与相应社会结构转变做深入分析,解释体操运动员的参与行为。

李宁在奥运会上实现体操项目金牌零的突破,不仅振奋人心,也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该届奥运会后体操项目受到重视,离不开当时的国际环境,当时国家正处于发展阶段,各方面实力在国际上还处于较弱水平,国家急于寻找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身实力的机会,竞技体育成为当时更好的选择。“举国体制”下发展竞技体育,该体制对运动员训练、管理、就业和安置等确立一系列的保障制度。运动员若能获得优异的竞技成绩,可谓“前途光明”,能在退役后获得稳定的工作,对于家庭经济一般的运动员具有吸引力。所以,在这样的社会结构背景下,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体操运动员愿意参与竞技体育项目,对他们而言既是荣誉也是保障。

笔者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体操发展的轨迹发生转变,社会结构发生转型。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发挥,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引发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引起社会多因素的改变,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3]。社会转型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化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包括:(1)体制转型,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2)社会结构转型,具体内容包括结构转换、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等^[1]。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发生改变。而在对外关系上,坚持开放政策,由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变。社会转型使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以及人际关系等都发生改变^[7]。

(二)体操运动员参与行为的转变受社会转型影响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竞技体育也随之转型,竞技体育由重“竞技成绩”转变为重“群众体育”“全民健康”。竞技体育不再是展现国家强盛实力的唯一手段。人们对竞技体育也淡化了“金牌效应”,更重视运动员的“个体发展”^[8]。社会转型使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特征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基于以上改变,产生了社会行为、观念的改变,这成为体操项目发展受限的原因^[5]。

近年来因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参与体操项目的人数缩减。此外,媒体对体操的关注点多为体操训练的苦、累和难。多因素的转变均与社会结构转型相关,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改变,不仅为追求稳定的工作、优异的竞技成绩,更以追求良好的生活质量为目的。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转型使运动员退役后的安置形式更具多样化,以“退役金”的安置形式为主,鼓励运动员自主创业和自主就学。但由于体操项目运动员退役时低龄化的特点,达到健将级以上的运动员数量不多,对省一级、市一级就被淘汰的运动员而言,因训练影响了学业,被体校淘汰后因年龄小,和专业化训练导致文化水平低,退役后的安置和再学习受影响。已获得优异竞技成绩的运动员退役后一般选择高校继续深造,但较低的文化水平是否影响退役运动员们的后续学业安排值得探讨。社会结构转型导致竞技体育转型,转型改变了社会行动者的参与行为,仅有少部分人愿意参与体操项目,导致体操后备人才锐减。

综上,就体操运动员而言,参与体操的行为受社会结构的影响。其一,社会结构的转型促使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制度转型,竞技体育地位发生转变。其二,社会结构的转型导致社会行动者的参与行为发生改变,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人们思想的改变,在物质生活满足的前提下,注重精神生活的追求,注重“个体”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导致参与体操运动的人数锐减。

三、体操运动项目未来发展的建议

作为竞技优势项目,体操项目有一定的传统、

经验和基础,所以体操未来的发展应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一)相关体育职能部门应制定符合社会转型的对策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应重视社会行动者的个体发展。人们价值观随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体操职能部门应重视运动员个体发展,也重视运动员文化知识的积累和个人综合素质的培养,退役后应积极做好运动员安置保障和再创业指导。体育职能部门作为行动的主体,对社会结构转型发挥的作用并不大,这是由于“举国体制”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竞技体育“金牌效应”慢慢淡化但并没有消失,社会转型需要长期的适应过程。体育职能部门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整体看,体育职能部门与体操行动者接触并不多。所以,体育职能部门作为体育管理机构与执行机构,应为竞技体育的转型做出适合的政策调整。

(二)体操项目应积极应对社会结构的转型

社会结构的转型都对体操运动员、运动员家长、教练员及相关体育职能部门带来影响,他们不应被动地接纳,而应主动做出适合自身发展的回应,重新规划体操项目的训练目标和工作目标。体操运动员面对社会结构转型的挑战,应根据自身的特点、竞技能力和家庭条件做出适合自身发展的调整。作为运动员家长,对社会结构的转型也应积极选择适合子女发展的道路。教练面对体操项目的实际困难,更应为运动员做好规划,让成才之路更广更宽。为应对社会转型,体操项目的发展应改进传统招生模式,推行“快乐体操”,在基层幼儿园开

展体操课程,以“体教融合”的模式扩大体操项目的普及^[9]。体育课程中结合体操基本功教学,做到基础教学与选材相结合模式。例如,重视体操基础姿态的培养、意志力训练、柔韧性训练和力量训练等内容,积极推广体操项目,学校以“体教融合”的模式作为后备人才培养的基础,打好培养后备人才的基础^[9]。

参考文献:

- [1]韦伯.社会学基本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2]高觉敷.西方社会心理学发展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 [3]郑杭生,洪大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内涵[J].社会学研究,1996(1):58-63.
- [4]万义,杨海晨,刘凯华,等.工具的展演与逻辑:村落女性体育活动参与行为的人类学阐释——湘西三村女性群体的口述历史与话语解构[J].体育科学,2014,34(7):23-29.
- [5]王宏.中国社会转型与体育价值观念良性促进关系模型构建与解析[J].体育文化导刊,2018(10):7-10,20.
- [6]钟秉枢.新型举国体制:体育强国建设之保障[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45(3):1-7.
- [7]陆学艺.21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J].社会学研究,1995(2):3-11.
- [8]李春桥,常益.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历史机遇、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安徽体育科技,2020,41(6):1-3,7.
- [9]郝东方,刘昕.新时代体教融合的教育逻辑[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1,44(1):35-42.

(编辑:陈越)